



红色电报长征记

袁以辉

新 蕾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刘希立
插图：



统一书号：R3213·13

定 价：0.72 元

袁 以 辉

红色年代记忆

袁以辉



新 蕾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凤礼

红色电台长征记

袁以辉

•

泰山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875 插页2 字数86,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R3213·13 定价：0.72元

序

曾 三

无线电台，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普遍使用的现代化通信工具，被人们誉为“顺风耳”、“千里眼”。但是，我们党和红军到1928年还没有这个东西，对于军队指挥和工作联系都很困难，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显得更加重要。因此，无线电台的建立，就成为党中央和军事指挥人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因素之一。

新生事物，总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我们党领导的无线电通讯事业，也是这样。为了建设起无线电台来，就需要解决一个干部问题和一个通讯材料问题。当时无线电通讯器材是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在市场上不能随便买到，所以我们主要靠在战场上夺取敌人的无线电台来武装自己。对通讯人才的培养，就更复杂和困难了。1928年，党中央就选派知识分子去学习，有的在家里自学，有的考入当地的无线电学校。这样，我们地下党在1930年就建立了第一对无线电台，并准备选派无线电技术人员到根据地和红军中去开展这一工作；同时在红军中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注意到夺取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器材和劝留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技术人员为我

们工作；还有一些技术人员是从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中转到我们红军中来的。但是这方面人员的数量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在红军中抽调粗通文字的青年战士学习无线电业务。经过培训，在短短的几年中，无线电干部的人数在迅速增长着。1931年的时候，我们还要从国民党占领的白区向根据地和红军输送这方面的人才，到了1933年以后，就能把自己训练的干部从根据地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去了。本书所提到的李白同志，就是党培养起来的、从延安派往上海坚持电台工作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个好同志。

袁以辉同志写的《红色电台长征记》一书，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至抗日战争初期中国人民革命处于最艰难、最复杂的非常年代为背景，从一个侧面记录了红色电台活动的历史片断。读了之后，使我非常感动，它把我带到四、五十年前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烽火漫天的岁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诞生数年后的1930年，无数先烈用鲜血从敌人手里夺取了电台，武装了自己，为革命战争服务，对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央苏区，敌人采取经济封锁的恶毒手段，妄图使中央苏区的广大军民无法生存，无法进行革命战争。为了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那样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党和红军部队仍然坚持办校，积极培养无线电通信人才。参加无线电学习的红军战士，以顽强拼搏的精神，克服了文化水平低，物资奇缺的重重困难，获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尤其是在长征途

中仍然坚持学习，这种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在形势急剧变化的长征途中，党中央和红军指挥员依靠红色电台，保持与各部队、各单位的密切联系，获得重要情报，从而作出指挥判断，进行战斗部署，下达作战命令，使红军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支伟大的常胜部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红军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打到抗日前线，并把战斗的胜利消息传向四面八方，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红色电台的存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也就同时说明了现代科学技术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人们熟知的四渡赤水，回师遵义，命令各部队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召唤处于“孤军”作战的红九军团迅速归队北上，翻越大雪山，横跨大草地，坚持会宁城战斗，等等，都是通过红色电台进行指挥部署的。

电台人员，包括报务、机务、运输、架设等人员，都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争先保护红色电台，做到“人到机器到”，与电台共存亡。这种负责精神和牺牲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是青少年一代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抗日战争初期，为唤起全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红色电台活跃在敌人心脏，电台工作人员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有的红色电台人员被敌人逮捕后，受尽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他们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其高风亮节，堪为后代楷模。

现在，中国虽然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人们依

然可以从中国红军的长征中吸取勇气、力量和智慧。如今几岁、十几岁的少年儿童，再过十年二十年，你们就将成长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读一读袁以辉同志写的这本《红色电台长征记》，会帮助你们认识到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何等重要；更会使你们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只有掌握在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强意志的人手里，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少年儿童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正确方向，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用崭新的科学技术去创造美好的明天吧！

1984年6月25日

注：曾三同志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党和红军创建红色电台时期的领导人之一。

目 录

一	填表的风波·····	1
二	谁当老师好·····	6
三	“土包子”学英语·····	14
四	三个病号·····	21
五	长征路上办学校·····	26
六	第一份电报·····	35
七	回师遵义·····	41
八	金沙江畔·····	47
九	在凉山彝族区·····	54
十	“立路”和“猴愁路”·····	59
十一	笑谈“蜀道难”·····	65
十二	英雄能过大雪山·····	71
十三	草地探路·····	78
十四	牛屎房·····	82
十五	饿·····	87
十六	大草地·····	91

十七	在生命垂危的时候	98
十八	跟随周副主席赴延安	102
十九	东渡和西征	112
二十	姑娘的面纱撩开了	115
二十一	会师前的激战	121
二十二	陕南山区的钢刀	127
二十三	换军帽	131
二十四	新的任务	137
二十五	零点到了	141
二十六	红色电波永不停息	147

一 填表的风波

1934年3月的一天，当晨雾在山峦中间渐渐散去，天边染上一抹朝霞的时候，我告别了领导和战友，告别了中央红军通信学校司号连，告别了我那心爱的军号，带着领导和战友们的祝愿，背着背包，大步流星地穿过瑞金街道，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前往中央军委通信学校第一大队的所在地——瑞金云集区坪上岗，参加无线电通信班学习。

第一大队设在一家土豪的院子里，墙上的石灰已经斑斑驳驳，上下两层楼房，楼上是实验室，楼下是教室。在地下打几根木桩，再加上旧木板，就成了课桌和凳子。虽说是三月天，然而春寒料峭，北风从破旧的窗纸钻进来，身单衣薄的红军战士，依然抖擞精神，坚持上课。

这一期无线电班共有八个人，都是从部队选调来的。因为都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低，听说无线电难学，不知道会碰到些什么困难，所以每个人的心情都很紧张。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坚决完成领导交给的学习任务。

刚到学校，训练处主任张瑞同志发给学员登记表，叫我们填。这张表象一张试卷，一下子把我们八个人都“考倒了”。叶德胜小声地问我：“袁以辉，表上‘性别’这一栏怎

么填？”

他的声音虽小，但大家都听见了，一起围拢来，七嘴八舌地说：

“是呀，这‘性别’是什么意思？”

大家瞪着眼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地发愣。

“‘性别’就是姓张还是姓李嘛。”

“不对，前面有一格‘姓名’，难道填了姓名又填姓什么，这不是戴上斗笠又戴上草帽吗？”

忽然，大个子李贻玉象找到什么窍门似的，放开他那粗大的嗓门说：“叫我看，‘性别’就是性子的意思，也就是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脾气。没错。就这么填：我——李贻玉，性子急躁，又偏偏爱吃热豆腐，打起仗来喜欢拼刺刀，特别是喜欢刺刀见红！”李贻玉的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问：“李大个，这‘性别’后面只有一小格，你说的那一大堆意思能填下吗？”

李贻玉被问傻了眼，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搔了搔头，哈哈笑道：“干这行没有打仗洒脱，打起仗来，冲上去，我可不管他‘性别’不‘性别’，先给他来个——”他做了个刺杀的姿势，一字一板地说：“刺——刀——见——红！”

叶德胜说：“曾政委在开学动员会上，要求我们做到政治坚定，体格健康，学好技术。他还说学校也是战场，要攻下技术关，不比打仗容易，是用笔杆子消灭‘敌人’。你用刺刀能把这个‘性别’捅出个意思来？”

“好，你有能耐，别的大道理不讲，你说‘性别’是什么

意思？说出了，我请你坐上席。”李贻玉冲着叶德胜嚷了起来。

叶德胜也被“将”住了。

大家正争得不可开交时，沈一力老师来了。我们都象得救似地争着向他问那个“性别”是什么意思。

沈老师拿过表格望了一眼，把表格往课桌上一扔，脑袋晃得象拨浪鼓，瞪着吃惊的眼睛，望了望大家，以鄙夷的口气说：“真糟糕！真糟糕！‘性别’都不知道，还学什么无线电！”

哎！这位老师以这种态度对待红军战士，我们感到很不是滋味，但又拿不出什么理由去反驳他，只好平心静气，瞪着发愣的眼睛。

“愣什么？‘性别’就是你是男还是女嘛！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真是‘土包子’！”沈老师说完就走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土包子’……老师走了，不要我们这些‘土包子’了……”大家的脑子里象翻腾的海水，望着老师离去的方向，更愣了。

“‘土包子’，‘土包子’怎么样？‘土包子’不能上学？”



我的气很大。这时，我不禁想起临来时指导员跟我讲的话。那天，指导员肖月荣同志把我找去，对我说：“袁以辉，上级要我们选调两位同志去通信学校学无线电，条件是政治可靠，经过战斗考验，脑子灵活，有文化。组织上决定选调你去，怎样？”

我的家穷得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姐姐、妹妹因病无钱医治，先后死去。我八岁那年，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承受着穷困的折磨，咬紧牙关，才送我读了一年书；十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家里塌了半边天；我十三岁的时候，只得去当地主的牛头仔。我说：

“指导员，我才读了一年书，行吗？”我嘟囔着嘴，尴尬地说。

“行！”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当然罗，只读了一年书不能说有文化，这是对比来说的。红军战士绝大多数都没有进过学校门，象你，能写个花名册，就算是不错了。你大胆去吧！”

“好，我服从组织分配。”

我就是这样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的。可万万没想到，老师嫌我们是“土包子”，还无缘无故地挖苦了我们一顿。有什么法子呢，谁叫我们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不懂呀！

这时，李贻玉抓起铅笔，狠狠地在表格上戳了个洞，气呼呼地盯着沈老师走去的方向。

“喂，李大个，你怎么不填？”我用手捅了他一下。

好一会儿，李贻玉从他紧闭的嘴唇里迸出一句话：“岂

有此理，一个俘虏兵倒来训我们！”

同志们都很惊讶！

“沈老师是俘虏兵？”

“他什么时候被俘的？”

李贻玉气愤地说：“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在滕田被我团俘虏的。我们红军优待他，他不仅不感恩戴德，反而训人，我想不通！”

当时俘虏兵补充到红军部队的不在少数，但象沈一力老师这样公开鄙视我们的却少见。

费了很大的劲，我们终于填好了表，上交后，领导上指定我当无线电通信班的班长兼学习组长。

二 谁当老师好

刚当上班长，班里就出了事。

这几天，李贻玉有时沉默不语，有时发两句牢骚。这天清早，他竟收拾行装，打起背包来了。我笑着问：

“李贻玉，你打背包干什么？”

“回前线打仗去！”稍停，他愤愤地说：“要是我再抓到俘虏，先问他敢不敢凶里凶气对待红军，要是他说敢，我就来个先斩后奏！”

噢，原来他还在生沈老师的气呢。对这件事，我心里也觉得不舒服。心想：不如回部队去打仗痛快，但自己是班长，就只好强忍着。我劝他：

“凶就让他凶呗，他能把我们怎样！”

“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

我怎么受得了呢，只因刚来，不好说啊！

同学们都来劝他，劝不住，他背起背包就走。我急了：“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你要犯错误的。要走，咱们一起走，但必须向组织打个招呼。”他根本不听，仍往外走，头也不回。

我跑去找曾三政委，把情况报告后，我们追上了李贻

玉。曾政委以严厉的口气喝道：

“李贻玉，站住！你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学校就是战场，你这是临阵逃跑！”

听到政委批评这是“临阵逃跑”，我感到震惊。这种批评不仅李大个子接受不了，我也接受不了。是“临阵逃跑”吗？我不知不觉地自问。四年前的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我的家在江西赣县湖江。1929年6月，毛委员和朱军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后，家乡搞起革命来了。我父亲袁奕福当暴动队员，后来家乡又被敌人占领，党派他潜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不幸被捕。四天后，我提着篮子，带着姑母炸的油饼、小鱼，跟着姑父去湖江靖卫团看望父亲。刚走到湖江街口，就听说靖卫团要杀一个共产党员，正是我父亲。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我嚎啕大哭起来，姑父的眼泪簌簌地往下掉。这时，一位穷苦大伯安慰我们不要哭，说哭也没用，提醒我们赶快去看父亲一眼。姑父领我直向靖卫团走去，两个靖卫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拦住大门，姑父苦苦哀求，才允许我们进去。我同姑父经过大天井，在一个石柱上看见了五花大绑的父亲。他满身伤痕，脸上血迹斑斑，昂着头，瞪着血红的眼睛，透过天井怒视苍天。我心如刀绞，一迭连声地哭喊着：“爸爸！爸爸！”父亲低头见了我，用慈爱、怜惜而又寄以希望的眼光望着他这个独生子，激动得久久没有说出话来。我知道父亲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可又不知从哪说起。我也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